

当年“虎烈拉”为何肆虐北平？

1943年的8月，巨大的乌云突然笼罩在了北平的上空，在日本侵略军占领下的这座古老的城市，发生了导致数千市民死亡的“虎烈拉事件”……(虎烈拉即霍乱，霍乱是一种急性腹泻疾病，由不洁的食品引起，病发高峰期在夏季，能在数小时内造成腹泻脱水甚至死亡。)78年过去，今天已经很少有人记得这起惨剧，但在很多经历过那段岁月的老北京人的回忆录中，我们依然可以体会到那可悲和可怖的一幕。

老北京防疫逐步推进

辛亥革命后，清帝退位，新建立的国民政府逐渐开始推进一系列适应世界潮流的改革。卫生防疫工作是重要的内容之一，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像北京、上海、南京这样的主要城市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以北京为例，由市政机构和官办医院主导的对各类传染病的预防工作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华北地区历来是传染病的多发之地。二月到五月流行的天花、二月到四月流行的白喉和脑膜炎、三月到七月流行的猩红热和回归热、四月到七月流行的斑疹伤寒、七月到九月流行的霍乱、伤寒和痢疾，秋冬时节随时可能暴发的肺鼠疫……简直没有一刻消停的时候。所以，民国后，对传染病的防治工作被当时北平市政府列为重中之重，最具标志性的便是在东四牌楼北十条胡同开办了传染病医院。按理说这里人口稠密，并不适合传染病医院的设立，但考虑到“现在社会风气尚未大开，地点愈远恐人民愈不愿就診”，故作权宜。几年后移至天坛的神乐署，后因就診人数的增多和天坛过于偏僻，又迁至朝阳门内南小街陆军军医学校本部，天坛的神乐署改成临时防疫医院。

1918年，内务部于传染病院内增设传染病研究所，并添设中央卫生试验所，一年后在其基础上成立了中央防疫处，这是中国专设防疫机关之始。中央防疫处占地八十余亩，“除办公室、图书馆、售品室外，技术室连亘数十间，内有锅炉房、培养基室、试验室、分装室、疫苗室、结核素室、血清室、鼠疫疫苗室、检查室、冰室、汽火室、冷藏室、动物室、疫苗室、狂犬病疫苗室、药品器械库等”，技术设备在当时可谓先进而完善。

随着医疗设施的完善，针对各类传染病的预防工作也得到有条不紊地推进，以免费的种痘为例，1910年北京官方才逐步推进，到1932年北京市教育局卫生教育委员会已经决定在全市各中小学校中一律施行。此外各种舆论宣传也加紧跟上，除了媒体报章之外，宣传种痘的传单、标语和种痘券也都由各自治坊分发给居民，甚至还在每周二由北平广播无线电台进行宣传，这样到1937年的春季，原本预计的种痘人数为7万人，实际达到了105248人，可以称得上成就斐然了。

除了上述预防手段外，在应对突发情况下，市政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比如要求执业医生每周将各种异常症状向卫生机构汇报，这样一来，当周边地区有疫情发生时，会采取紧急的应对措施。1918年初春，通县突然发生了鼠疫，内务部立刻在各城门增设卫生队兵，对进城的行人进行检查，铁路局也在车站派检疫医官和卫生巡警或设立防疫检查所，检查来往旅客；还临时筹建卫生警察，分配至各冲要地方执行公共卫生事务，遇有暴死者，即使没有检查出病因，仍然为谨慎起见，将死者的同屋人送往传染病医院进行诊断……可以说，正是上述一系列的工作，使得民国后的北京城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恶性传染病流行。

这一切，随着卢沟桥上的枪声响起，被侵略者的铁蹄无情地蹂躏。

日军打着“医治”的旗号作恶

日寇占领北平后，对这座伟大而古老的城市除了掠夺和抢劫，没干过一件好事。市井萧条就不用说了，所有原本的现代化进程一律被硬生生斩断，卫生防疫工作自然也在内——侵略者怎么可能关心



中央防疫处在天坛神乐署为儿童接种疫苗。

被占领区人民的死活。北平的城市卫生每况愈下，街头巷尾充斥着粪便和垃圾，到处蚊蝇麇集，臭气冲天，很多已经销声匿迹多年的传染病又重新流行起来。“虎烈拉”的突然暴发，就成了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意料之中的事情了。

“虎烈拉”就是霍乱，因其传染迅速，死亡率高，一旦流行起来势如猛兽而得名。其病原体是霍乱弧菌，症状是日夜不停地腹泻、呕吐，大便稀得像米泔水一样，浑身痉挛，手足发冷，接着因为体内大量失水，故眼窝凹陷，手指和脚趾干瘪，如果抢救不及时，很容易导致死亡。北京文史学者王永斌先生在《老北京五十年》一书中回忆：“石景山制铁所数千工人闹霍乱，死亡2000多人，而全市有多少人得此病，死亡多少人，因日本侵略者封锁消息，就无法估计了”。

“虎烈拉”在北平暴发后，日军除了在交通要道设点检查之外，还向过往的蔬菜车上喷消毒水，命令各家撒生石灰。文史学者成善卿先生在《天桥史话》中回忆：“日寇只要发现一家有虎烈拉病人，就立刻封锁整条胡同，以草绳拦挡两端路口，禁止居民出入，有违犯者轻则被日寇用枪托子或‘懒驴愁’(一种牛皮鞭子，二尺半长，鞭杆与皮条各半，抽一下即血晕)殴打得遍体鳞伤，重则被处死”。

至于那些不幸得了霍乱的苦难同胞，日寇以“医治”为名，一律押送到天桥收容所。这样的收容所在天桥一带共有三处，一处在城南游艺园旧址，另外两处是在天桥东北角山涧口内的十五间房和后坑。“虎烈拉病人一进收容所，即等同于判处死刑，不是被活烧，就是被活埋，而城南游艺园旧址就是当年日寇活烧中国同胞的罪恶之地。所谓活烧，即以绳索缚病者手足，扔在石灰堆上以水淋之，石灰遇水碎裂，放出大量的热，病者顿觉灼热难忍，疼痛钻心，其哀求与喊叫之声凄厉，附近居民与路人闻之无不凄然泪下。那些营养极度缺乏而又被病魔侵害得非常虚弱的男女老少，再也承受不住这种极端残忍与痛苦的折磨，不消一日，便与附着在体内的病菌一并被埋进右安门外的万人坑……”

北京文史名家胡金兆先生在《见闻北京七十年琐记》中回忆，当时满城都是日本兵，稍有可疑就会被抓走，吓得商家关门，百姓闭户，但生活还得继续啊，所以很多人只能冒险上街。“一天，母亲带我到西单菜市买了熏鸡、酸雪里蕻、咸鱼等，从宣武门出城回家。城门口进出城的人排成长队，城门外排放着十几口大缸，缸里全是漂白粉消毒水，出入城的若带有食品，不管生熟，日本兵夺过来一律扔在大缸中浸泡消毒，之后再甩给你，至于能吃与否，日本兵则一概不管。母亲与我只好苦笑，刚买的東西全糟蹋了，还得偷偷扔。有的人舍不得，跟日本兵、伪军警争呀，讲理呀，挨一顿打是轻的，要让抓走，就从此就没了下落。”

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胡金兆生病了。

那时正放暑假，胡金兆中了暑，上吐下泻，症状和霍乱十分相像，这时街上风声很紧，要让日本人发现就麻烦了，只有赶快去医院。“母亲马上雇了辆当时刚出现的三轮车，我上车后偎在母亲怀里，假

装睡着了，脸上蒙块手绢”，这样终于混过了日本兵把守的和平门，来到北大医院就診，最终确诊为急性胃肠炎，打针吃药后，医生给出了诊断证明，一家人心里的石头才落了地。

三

到底是誰散佈了“虎烈拉”？

从“虎烈拉”暴发那一刻开始，北平市民们就对其起因议论纷纷。在侵略者的枪口和刺刀下，任何真相都不可能揭示，最终人们只能归结于是混合面不干净导致的。据王永斌先生考据，这一说法一直延续到2000年《北京崇文区志》出版前，而《北京崇文区志》所揭开的真相令人大吃一惊，原来这次给北平市民带来巨大灾难的传染病事件，完全是日寇刻意所为。

“七·七事变”后，日军在北平成立了细菌战队“北支甲第1855部队”，西村英二担任队长。并在天坛内设立了细菌研究所，由臭名昭著的731部队队长石井四郎担任技术指导，负责1855部队的细菌生产和细菌研制工作。据有关史料记载，这支部队十分庞大，定员1500人，除了占有天坛神乐署等不少建筑外，还新建了很多房子，除去宿舍与病房外，仅工作室就有100多间。该研究所研究并制造的“细菌战剂”分为“致死性战剂”和“失能性战剂”两大类，前者包括鼠疫杆菌、霍乱弧菌、炭疽杆菌、野兔热杆菌、斑疹伤寒立克次体、东方马脑炎病毒等十多种，后者包括布氏杆菌、Q热立克次体、球孢子菌等。1940年10月28日，由石井亲自率领一支部队，带了七十公斤的伤寒菌、五十公斤的霍乱菌和五公斤染有鼠疫菌的跳蚤，乘坐飞机到宁波市上空进行散布，未及三天就在宁波造成了骇人听闻的惨案。

而1943年的“虎烈拉”大暴发，也是1855部队犯下的罪行。据《北京崇文区志》记载：“1943年8月，1855部队在北平地区进行散布霍乱菌实验，霍乱迅速在室内外发生、蔓延。(崇文)境内的玉清真、文昌宫、金鱼池、东花市、崇外大街、西打磨厂等地，都发现了大批霍乱患者。截至十月月底，城区共发现霍乱患者2136人，死亡1872人，其中路死亡92人。当时，西村英二命令受训的250多名候补下士官，上街检疫，将染疫者全部羈留，然后烧死或活埋。仅据战犯长田友吉供认，就有300多名中国人被日军害死。事后，日军诈称霍乱系自然发生。”

至此，“虎烈拉”大暴发的真相已经昭然天下。尤为可怖的是，1942年春天日本特务机关长大本清在冀中第八路军捕获，据供认：日本在华北的北平、天津、大同等地都有制造细菌的场所，日军中经常配有携带大量鼠疫、伤寒和霍乱等菌种的专门人员，只要有命令就可以施放……

视占领区如细菌战实验场，视占领区人民为小白鼠，这就是日寇鼓吹的“王道乐土”……近年来，一些为日军侵华暴行进行辩解甚至美化的言论，在国外中时有出现，除了“丧尽天良”四个字之外，我不知道还能给予什么样的评价，翻开那一段历史，每一行每一字无不浸透着斑斑血泪，任何人都无权蘸着这些血泪为那段历史描绘花边——任何人！

本报综合消息

古代慈善杂谈

最近，山西发生洪涝灾害，人们纷纷捐助献爱心。助人为乐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千百年来，当社会出现灾害或者困难时，总是有热心的人站出来，伸出援助之手。

按常理，热心的捐助总是会受欢迎的，可是在汉武帝时期，有一个人的捐助，最初竟然遭到了拒绝，他就是卜式。

《汉书》、《史记》等典籍记载了他的故事。《史记·平准书第八》记载：“初，卜式者，河南人也，以田畜为事。”卜式有一个弟弟，当弟弟长大后，卜式从家中分出居住，当时他只取羊百余只，田宅财物都分给了弟弟。卜式入山牧羊十余年，羊多达千余头，于是便购买田宅。而他弟弟不善经营，倾家荡产，卜式于是多次分给弟弟财产。由此可见，卜式的为人非常质朴厚道。

汉武帝时期，汉朝正在抵抗匈奴入侵，卜式上书，愿意捐出一半的家财资助边事，“愿输家财半助边”。谁想，他的这份热情不仅遭到了汉武帝的拒绝，汉武帝还派人去调查卜式的真实目的。专使问卜式：“你是想当官吗？”卜式说：“我从小牧羊，不会当官，也不愿意做官。”专使又问：“那是你家里有冤情，想申诉吗？”卜式说：“我生来与人无争，遇到贫穷的乡人，我就借钱给他；为人不善的，我就教他做好事。我无论到哪里，人们都很尊重我，哪来的仇人啊！”专使说：“既然是这样，那你究竟想要什么呢？”卜式坦然地说：“天子诛匈奴，我认为贤者宜死节，有财者宜出钱，如此，匈奴可灭。”

专使听后回去报告了朝廷。汉武帝也对丞相公孙弘讲了，公孙弘认为：“这不符合人之常情，希望陛下不要允许。”于是，汉武帝拒绝了卜式捐款的要求。

一年后，因为与匈奴的战争，再加上匈奴浑邪王等归降汉朝，需要安置，朝廷开支过大，国家粮仓和钱库空虚，进而流民增多，各级官府无力安置这么多流民。卜式得知这一消息，就出钱20万捐给河南太守。后来，河南太守把此次为官府捐钱的人名单呈给朝廷，汉武帝又看到了卜式，汉武帝想到一年前卜式上书要求输财之事，这才相信卜式的确是一个仗义疏财之士。汉武帝赐给卜式一些钱，卜式把这些钱“尽复与官”。

汉武帝大为感动，“乃召拜式为郎，赐爵左庶长，田十四顷”，并且“布告天下，尊显以风百姓”。但卜式拒绝了做官。汉武帝便让卜式去上林苑养羊，卜式接受了。一年后，卜式把上林苑中的羊养得膘肥体壮，汉武帝看后非常高兴，就问卜式牧羊之道。卜式不仅讲了养羊的心得，还从养羊联系到当官为政。汉武帝非常喜悦，便任命卜式为缙氏县令。卜式勤政爱民，政绩显著，不断升迁，一直被提拔为齐王太傅、刘王相。元鼎年间(公元前116年至公元前111年)，卜式还担任御史大夫一职。不过，后来因为反对汉武帝的一些措施，卜式被贬为太子太傅。

宋代诗人苏轼为政尽心，诗文名满天下，更令后人钦佩的是，他有一颗仁爱之心。《宋史·苏轼列传》记载了他开办“公立医院”救治百姓的事迹，这件事也广为流传。

元祐四年(1089年)苏轼以龙图阁学士身份赴任杭州知府。刚一上任，就碰到了瘟疫大流行。杭州城里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是求医问药的百姓。

经过深思熟虑后，苏轼决定创办一家官办医院，救治百姓。可是开设医院需要大量资金，怎么办？他同属下商量后，决定采取募捐的办法。苏轼首先从府库里拿出2000贯平时省下的办公经费，同时号召城里的有钱人捐款，可是还缺不少钱。苏轼回家后，把情况同夫人王闰之说了，王闰之全力支持，带头卖掉陪嫁的首饰参加募捐，苏轼又拿出自己的积蓄五十两黄金交了上去。

在苏轼夫妇的带动下，参加募捐的人越来越多，总算把办医院的资金募集起来了。苏轼又聘请了一些医生，在杭州众安桥旁边找到了一处官家的院子，办起了一所医院：“安乐坊”。为了给百姓治病，苏轼的夫人还把祖传的秘方“圣散子”贡献出来，制成了大批药品。

安乐坊建起后，苏轼在派官员和医生分赴各个街巷救治病人的同时，还免费发放食品、药品。这些药品很有效，吃完药品后，不少百姓得以痊愈。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载：“作饘粥，药饵，遣吏挟医，分方治病，活者甚众。”根据记载，苏轼创办的安乐坊，“三年医愈千人”。

后来，在众安桥附近，苏轼又开一局：“惠民药局”，就如同现在的药店。史书还记载了苏轼智斗无良药商的故事：有个囤药的药商也感染了疾病，请了好几个名医都没看好，药商自家的药铺里没有管用的药，他听说苏轼安乐坊的“圣散子”有奇效，便让人去索要药方。哪知苏轼定了这样的规矩：只赠药，不开方；只赠穷人，不赠富豪。有钱人用药，每用一服，须捐助安乐坊纹银百两。

药商只好捐银子买药，“圣散子”药效明显，那药商吃了三服药病就见轻了。其他药商感染疾病后，也到那里捐款买药，苏轼变相收到了大笔募捐款，他用这些钱，又开了几个药局，方便百姓就近看病取药。

本报综合消息